

论大众传媒对历史记忆的表达

——以建国后孙中山“逢十”诞辰纪念活动为考察对象

熊秋良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逢十”诞辰举行的纪念活动,既是一种政治仪式,更是对孙中山的历史记忆。大众传媒采取了多种表达方式:新闻报道唤醒民众记忆;时人回忆增添记忆的真实感;影视文化产品再现“孙中山镜像”。在不断仪式化的历史记忆过程中,媒介通过不同时空轴线有意识地具象再现,使对孙中山的历史记忆深刻上国家、民族的印记,使孙中山成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的精神和政治文化符号。

关键词 历史记忆 大众传媒 孙中山 “逢十”诞辰

熊秋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研究员 210023

大众传媒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手段,而且是人类文化、民族精神在传承和延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渠道。历史记忆作为集体、民族和国家根基性情感联系的记忆,需要传媒的表达、叙事和建构,通过它不断地进行仪式化的重复再现,使国家、民族的象征符号和观念意识符号,一遍遍地得到演绎,借以向民众传递历史事实,表达历史观念,传扬民族精神,凝聚历史共识。正如台湾学者王明珂所言,我们记忆历史不是了解“那些史料表面陈述的人物和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本身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所隐蔽的社会与个人情境”^[1]。但无论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都需要某些可以让回忆固着于其上的“结晶点”,如某些特别日期、节日、事件和名字等,然后通过大众媒介传播它们所承载的历史意蕴和现实意义。2016年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本文拟以新中国成立后大众传媒对孙中山“逢十”诞辰纪念活动的参与和策划为样本,从实证角度探讨大众传媒如何唤醒和再现历史记忆,大众传媒进行的历史叙事如何与国家、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2]。

[1]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北京〕《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关于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纪念的研究,学界已有一些成果,如王连生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建构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历史记忆》(《南都学坛》2011年第6期)一文基于纪念活动的政治功能着重考察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历史记忆的内容、目的以及作用;韩亚光的《新中国领导人确认孙中山历史地位》(《团结报》2010年2月25日第7版)一文

一、建国后孙中山“逢十”诞辰纪念活动概况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即于1949年11月12日召开了孙中山诞辰83周年纪念会,由李济深主持纪念仪式。1956年是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也是建国后第一个孙中山“逢十”诞辰,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11月1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在政协礼堂举行的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由周恩来致开会词。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孙中山的革命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1]。1966年是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中央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的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周恩来在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广州、南京、上海和武汉等地也举行了盛大集会,缅怀孙中山的历史伟绩和革命精神。

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呈现蓬勃生机,中央对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活动高度重视。1986年11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北京各界人士和群众代表一万人参加的纪念大会,胡耀邦、彭真、邓颖超等出席了纪念大会。《人民日报》发表了《复兴中国文明的伟大先驱——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社论,肯定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实现了本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第一次腾飞。”^[2]1996年,迎来了孙中山诞辰130周年,11月12日,江泽民、朱镕基、李瑞环等出席了纪念大会,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于11日和12日播放了80分钟专题片《中山巍巍》,再现了孙中山伟大的革命业绩和人格魅力,在观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200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胡锦涛、吴邦国、贾庆林等出席纪念大会,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

纪念日如同节日一样,是人类社会逐步形成的对人物或事件进行记忆的时间符号,也是人们形成群体认同与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载体。不同时期从国家层面对孙中山诞辰举行的各种纪念活动是为了传承和延续对孙中山的历史记忆,只是在此过程中,需要借助大众传媒连接历史与记忆,在公众记忆中再现和形塑孙中山形象,并借以对关系国家、民族历史命运、现实使命和未来走向等重大议题进行多种叙事和表达,进而形成历史共识,达成现实的人文关怀。正如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所说:“往历史深处走去,大众媒介(包括流行书籍、学校教科书、电影以及新闻媒介)对历史事件的选择性纪念对公众议程影响深远,它不仅凸显了历史事件的显要性,而且也强调了我们的记忆中这些事件的特殊面与细节。”^[3]

二、大众传媒对孙中山历史记忆的表达

建国后,中央和地方每年都会在孙中山诞辰日举行纪念活动,尤其“逢十”诞辰纪念活动,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大众传媒积极参与、策划和报道,既体现了它的重要社会功能,也使对孙中山的历史记忆及其所承载的思想和精神得以表达和延续。

评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四位领导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对孙中山历史地位做出的科学评价;陈金龙的《毛泽东与纪念活动的政治功能表达》(《现代哲学》2009年第1期)在分析借助重要历史人物的纪念进行政治动员时列举了毛泽东对孙中山的纪念。这些文章大多从党史党建角度,探讨纪念活动的政治功能。

[1]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北京〕《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第1版。

[2]《复兴中国文明的伟大先驱——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社论),〔北京〕《人民日报》1986年11月12日,第1版。

[3]〔美〕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1. 新闻报道言说历史,唤醒公众记忆

由于伟人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国家和民族希望通过对伟人的诞辰纪念,让民众记住他们的业绩和精神,并进而成为构建国家、民族认同的情感基础和文化纽带。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大众传媒对建国以来孙中山六次“逢十”诞辰纪念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新闻报道,期以通过对孙中山伟大一生的回顾和革命精神的传扬激发民众对他的历史记忆。报纸作为媒介传播信息的主要载体,有其独有的优势,如信息量集中,对某一时期的主要议题可连续、滚动报道;内容更为详细,而且读者可以反复阅读,通过文字和图片,细细品味,理解隐含在文字和图片背后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以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人民日报》为例,1956—2006年间其对海内外各地举行孙中山“逢十”诞辰纪念活动的新闻报道就非常具有代表性,根据“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全文检索系统”统计,其报道的文章共有353篇左右。

报刊有自己独特的表意符号和叙事语言,其版面设计、排字方式、字号大小、图片插入都与报道的主题密切相关。在这里,“一切东西各有其位,一切东西井然有序。这不仅是排字工人铅字架的特征,而且是人类知识和行动整个组织安排的特征”^[1]。我国报媒的社会主义性质更体现了这些组织特征,这在对孙中山“逢十”诞辰纪念活动的报道中就得到明显的印证。报头的设计,版面的安排、纪念特刊的策划等,大众传媒的空间物质性进一步加深了读者对孙中山的历史记忆。以上述《人民日报》有关孙中山“逢十”纪念活动的新闻报道的版次为例,353篇报道的版次安排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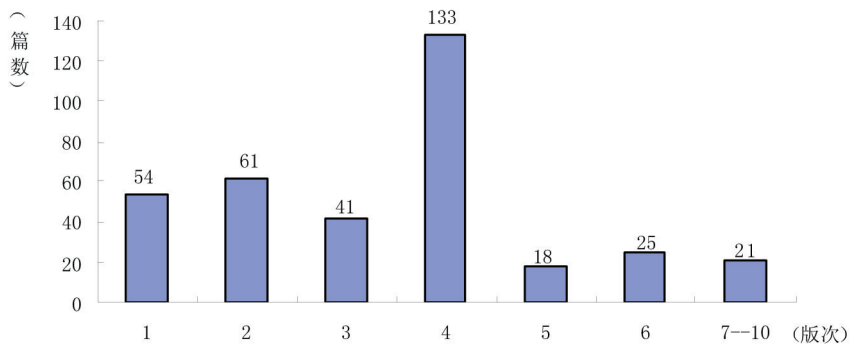


图1 《人民日报》对孙中山“逢十”诞辰纪念活动报道的版次安排

图1显示建国后《人民日报》有关孙中山“逢十”诞辰纪念的报道主要集中在第1、2、3、4版,第5—10版次之。第1版54篇文章主要为纪念孙中山诞辰发表的社论、北京隆重举行孙中山诞辰纪念大会的新闻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的讲话及纪念文章等。在版面设计上刊登孙中山的标准照片和孙中山“逢十”诞辰纪念大会图片。如195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发表了毛泽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社论《孙中山先生永生》以及新闻报道《北京各界人民热烈隆重举行大会,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2006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胡锦涛的《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新闻报道《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和《全国政协举办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招待会》。第2、3版102篇文章也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民主党派领导人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国外政府和团体代表的讲话、贺电以及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的新闻报道。第4版有133篇文章,是版次最多的,主要为各国领导人的贺电、时人的回忆文章、访谈等;第5—10版主要是与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相关的报道,如学术会议的召开、展览会的举办、历史文物的重大发现、纪念场馆的开放以及影片信息等。《人民日报》对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的多题材、多体裁和多角度的不间断报道,旨在将全国同一时间段、不同地域的民众有关孙中山的历史记忆纳入集体的想象空间,进而形成公众共同的记忆,并借以濡化他们对当下现实的接受和认同。

[1][加]埃里克·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8页。

2. 时人回忆增添记忆的真实感

在日常生活中,要凝聚群体的共识,我们就需要不断为群体提供能够进行集体记忆的线索,涂尔干认为:“在群体和社会的生活中,不存在空白点,表面上看,在创造性时期之间存在着真空,但这些真空是由集体记忆充塞着的,这些集体记忆以象征的形式显现。”^[1]大众传媒的历史叙事正好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记忆,传媒除了表达党和国家的政治主张外,还通过对与孙中山有过亲密交往的一些革命老人回忆的报道,使民众对孙中山的记忆更感到真实和亲切。以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为例,《人民日报》先后刊载了何香凝、李济深、吴玉章、张治中等人的回忆文章30余篇,兹将重要的文章列表如下:

作者	题 目	回忆人身份
何香凝	对中山先生的片段回忆	民革主要创始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
李济深	向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学习	曾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教练部少将主任
吴玉章	孙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精神	曾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
蒋光鼐	高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纪念孙中山先生	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大本营卫士营营长
蔡廷锴	我怎样受到中山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的启发和感召	曾任孙中山大本营特别团营长
张治中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实现了	曾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
程 潜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曾任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
陈铭枢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九十周年	参加同盟会,受孙中山教导
黄炎培	中国人民脑海中留着这样一个可爱可敬的孙中山先生遗影	参加同盟会,受孙中山教导
陈邵先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鼓舞了我们	同盟会会员,孙中山的追随者
熊克武	孙中山先生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参加同盟会,受孙中山教导
周士第	纪念孙中山先生九十诞辰	曾任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
张难先	我对孙中山先生的回忆和感想——纪念中山先生九十诞辰	辛亥革命元勋

根据安格拉·开普勒的研究,“同一个年龄段的人群,因一定的突出历史事件、说话和思维方式、榜样和他人以及幻想和精神创伤等等,被打上共同的烙印。只要同一代人还活着,这种记忆也就还活着。它直接同它的载体即同一个经历和回忆群体的时代证人们联系在一起的。”^[2]上述这些革命老人与孙中山是同一时代的人,也是历史的见证人,从其身份和革命经历可知,他们有的曾守卫在孙中山的身边,有的曾与孙中山出生入死从事民主革命事业,有的曾亲自得到孙中山的教导,有的受孙中山精神和思想感召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运动。他们对孙中山革命事迹点点滴滴的追忆、奋斗不息精神的缅怀、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肯定,以及对孙中山临终“和平、奋斗、救中国”遗志的现实表达,通过记者有意识的追踪报道,大众媒体的广泛传播,唤醒了民众对孙中山的历史记忆,保持了对孙中山共同的历史认识,进而建构对孙中山的集体认同。

3. 电视、电影作品再现“孙中山镜像”

电视、电影作为以影像传播为载体的大众传媒改变了历史记忆的方式,它通过听觉和视觉回忆形式,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非常形象而感性地铭刻在人们的脑海里。德国学者约恩·吕森指出:“在公共文化场景中,集体记忆已经被大量的活动影像及其图片资料所覆盖。”^[3]为了纪念孙中山,拍摄的纪录片和电影、电视剧相当多,它们通过多种艺术表现手段,连接历史与记忆,再现“孙中山镜像”,从而在公众记忆中塑造孙中山的伟大形象,并对其精神进行广泛传颂。

1956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纪录片《伟大的孙中山》,呈现了孙中山毕生从事民

[1][法]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5页。

[2][德]安格拉·开普勒:《个人回忆的社会形式》,[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3][德]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綦甲福、来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主革命的奋斗历程,突出孙中山伟大的爱国理想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许多民众第一次从银幕上看到孙中山为民主革命奔走奋斗的身影,非常激动,深受教育,该纪录片上映后即获得很好的口碑。1986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一批以孙中山光辉业绩为题材的故事片、纪录片和电视连续剧在全国范围内上映。如《孙中山在南京》、《中山颂》、《孙中山》(上、下集)、《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羊城蒙难》、《孙中山与宋庆龄》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等。这些影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银幕和荧屏上集中地弘扬孙中山奋斗不懈的革命意志、跟随时代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1996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传扬孙中山的丰功伟绩,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与中国社科院东方城公司合拍了时长八十分钟的电视专题片《中山巍巍》,从“缔造共和”、“强国之梦”、“天下为公”和“千秋基业”四个方面彰显孙中山推翻封建专制、致力民主共和、强调富国强民、坚持祖国统一的革命业绩和人格魅力。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忆从抽象的文字转向了直观的感觉,使人物形象呈现出更加生动、感人的艺术魅力。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所说:“凡是通过感官印象储存起来的回忆,都比通过语言重复这种媒体储存起来的回忆更加具有无与伦比的直接性和真实性。”^[1]在建构孙中山的历史记忆中,充分发挥了电影和电视大众传媒的优势,纪录片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镜头,再现了孙中山活动的历史场景,使观众聆听到了孙中山北伐誓师的演说,看到了孙中山亲笔写下的“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的条幅。这些大量影像资料的重现,使观众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时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的陈怀皑看了《孙中山》等纪录片后说:“影片没有停留在‘再现’的层次,创作者贯注了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和感受,强化了历史的意识。尽管资料是静止的,但经过选择、强化便复活了,具有了很强的表现力。”^[2]

电影、电视剧则以影像为本体,透过不同的镜像来叙述事件的发展脉络和人物的故事,经过创作团队记忆的努力追寻,对重大历史史实和历史人物的反复回忆、过滤、理解,这些保留的记忆通过媒介转变为影像,形成和深化了历史记忆的书写。《孙中山》和《非常大总统》等影片通过一个个有关孙中山主题故事的叙述,表现和演绎着历史上的“孙中山”,将其救国救民的核心思想刻画得淋漓尽致,使孙中山的精神、思想和人格魅力散发出特殊的“场”的效应,感动、震撼着观众的心灵,从而拉近了影片的文本话语与观众心理之间的距离,进一步诠释“孙中山镜像”背后蕴含着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三、余 论

由于时代背景不同,面临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同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在不同的时代,大众传媒有多样化的报道方式和表达主题,但其旨趣在于强化民众对国家、民族根基性历史的记忆,引导他们的历史认知与国家、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其一,历史记忆有其连续性的一面,它是对于过去的一种累积性的建构。建国后,对于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一直没有中断,“逢十”纪念活动更为隆重,中央、地方各类报刊、广播和电视媒体会集中地通过多种形式报道全国政协和民革中央纪念孙中山的活动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诞辰纪念大会的仪式和内容、海内外各界民众的纪念活动以及各种有关孙中山生平、革命事迹的展览会和图片展等。大众传媒对于历史记忆的建构是多层次、多渠道的,媒介的类型、议题的新闻价值和报道强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众保留历史记忆的痕迹和轨迹。大众媒介在构建社会民众对孙中山的历史记

[1][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德]哈拉尔德·韦策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2]李彤:《在银幕上弘扬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精神——孙中山题材影片座谈会发言摘要》,[北京]《人民日报》1986年11月11日,第7版。

忆过程中,非常好地抓住了这些影响因素。在文字、图像和声音三维立体的全时空报道中,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爱国主义者的形象得以立体地呈现。这表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在历史记忆领域所做的工作及其影响力仍是最大的。党的机关报、广播、电视节目和互联网等,都为民众提供了许多有关孙中山的回忆内容,并进行回忆启发,一方面这些媒体相互交叉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通过传媒机构化、制度化和仪式化的共同回忆,将记忆的内容周期性、持久地固定下来,不仅强化了大众对孙中山的历史记忆,而且巩固了他们对现存秩序合法性的认同,加强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契合。

其二,从文化的层面来说,对孙中山的历史记忆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不仅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且建构了“孙中山文化”。它所体现的孙中山奋斗进取、百折不挠的革命气魄、追求真理的不懈精神与近现代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富裕的主旋律是一致的,甚至具有世界意义。正如195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孙中山先生永生》所说:“孙中山——这一个争取人类的自由和平等、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的伟大战士的名字是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的。他的革命精神在进步人类的心里永生。”^[1]这样的记忆定位,印证了德国学者哈拉尔德·韦策强调的“对于回忆的情感品质,也必须予以特别关注”^[2]。尤其当大众传媒将对孙中山的历史记忆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时,这种情感品质不仅为记忆的重要性和持久性提供底蕴,而且在传承和延续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因此,哈布瓦赫在他的《记忆的社会框架》中强调,某一事件或者某个人若要在集体记忆中占一席之地,就必须要使其和得到集体认同的思想或者意义联系起来。

其三,如果说对孙中山的纪念和研究已形成了“孙中山文化”。那么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记忆也可以说是“文化记忆”。扬·阿斯曼认为在文化记忆中存在一种“凝聚性结构”。“凝聚性结构”在时间层面上,连接过去与现在,将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在社会层面上,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的^[3]。这种被剥离出来的内容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记忆而言,就是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爱国思想。胡锦涛在200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紀念大会上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为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实现国家统一、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的一生。”^[4]而对孙中山思想和精神的传承当然与大众传媒的表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大众传媒参与和策划了多种形式的孙中山记忆,使其所蕴含的国家、民族意识触及社会各个阶层,并且在不断仪式化的重复过程中得到强化,使对孙中山的历史记忆深深刻上国家、民族的印记,使孙中山成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的一面旗帜、一种精神和政治文化符号。因此,哈布瓦赫认为社会思想本质上是一种记忆,“只要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历史事实渗透进入了这种记忆,就会被转译成一种教义、一种观念或一种符号,并获得一种意义,成为社会观念系统中的一个要素”^[5]。

〔责任编辑:肖 波〕

[1]《孙中山先生永生》(社论),〔北京〕《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第1版。

[2]〔德〕哈拉尔德·韦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代序),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3]黄晓晨:《文化记忆》,〔北京〕《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6期。

[4]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3日,第1版。

[5]〔法〕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